

南漢〈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考釋

——兼說劉氏先祖血統問題

劉 文 鎖*

摘 要

本文就番禺新出土南漢康陵〈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碑，結合南漢有關史料及清代以來有關金石著作作一考釋，期對高祖劉龔一生行跡及南漢史有更全面瞭解。所論包括五代哀、諡冊制度及南漢廟制，劉龔之才能、性情與生平事蹟，包括其追尊先祖與「僭偽」問題、「北顧中原」問題、禮制與文化建設、興建宮殿苑林、信仰傾向、性情與才能等方面。同時就康陵〈哀冊文〉形制以及追尊先祖問題、墓上建築的形制幾個重要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特異之處，就藤田豐八所論南漢劉氏先祖血統問題提出疑義：〈哀冊文〉中的追尊先祖和劉龔信仰傾向，表明其家族之北方來源及非穆斯林裔；又據有關史料對劉氏之先世籍貫、姓名來源、南遷幾個方面的重新檢討，推測南漢劉氏為唐代入華定居中國的賈胡——安氏「九姓胡」之後裔，於唐末避亂隨南遷潮流徙居福建，後遷廣州，以武功建立割據嶺南的王朝，其血統不是阿拉伯或波斯裔。

關鍵詞：南漢、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劉龔、賈胡、五代十國

一、前 言

2003年6月至2004年10月間，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番禺區新造鎮

收稿日期：2006年11月13日，通過刊登日期：2008年4月23日。

* 作者係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小穀圍島「大學城」工地調查並發掘了兩座磚室墓，分別位於島西部的北亭村大香山和青崗。經發掘證實，這兩座墓一座是南漢高祖劉龔（917-942在位）的康陵（北亭村大香山），另一座（青崗）據認為是烈宗劉隱的德陵。¹ 其中的康陵因墓門內側保存有〈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石碑，故可以確認墓主身分和陵墓性質無疑。在發掘當中，筆者曾有幸參觀。因為對南漢國史的興趣，又考慮廣州「海上絲綢之路」考古研究問題，遂對碑文及陵墓形制有所重視。案南漢國史，史書中雖有記載，但粗略、偏頗至為明顯，治史者鮮為重視的原因，其中當有此史料不足的問題。另外，南漢國祚短促，在唐、宋兩大王朝之間，也許有人認為充其量是一段過渡的地方史；不過，依筆者看，其史學研究意義可能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中國文化的框架下，這個短暫而獨立的王朝與中原的關係；二是它在中外關係史上的地位，事涉唐、宋之際中國對外交往格局的轉型以及賈胡、「蕃客」的動態問題。後者所涉，過去研究中偏重唐、宋兩代對外交通與貿易，所倚賴的是歷史文獻，而通過考古遺跡、遺物的研究以窺測文化史、社會史的面貌，尤其是入華蕃商胡客僑民的文化與社會生活，是尚待開展的領域。就南漢史料問題而言，清代金石學及《廣東通志》等著作中，著錄有一部分屬於南漢的遺跡、遺物，其中包括〈康陵碑〉的簡略信息；如果加上現代考古工作所獲得的墓葬和碑刻資料，已可以就若干問題展開討論。現南漢二陵的新資料已經公布，對南漢國史和南漢考古的研究來講，都是件盛事，其意義自不待言。本文根據其發掘報告，試對康陵〈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作一考釋，並就史料及〈哀冊文〉、墓葬形制等線索，對藤田豐八所論南漢劉氏祖先血統問題給予討論，以求正於識者。

二、〈哀冊文〉錄文與著錄

現據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銖積寸累》發表的該碑拓片，並參考該所〈廣州南漢德陵、康陵發掘簡報〉的錄文，對碑文重做錄校如次。碑文楷書，首題「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38行，滿行34字，共1062字。²

1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廣州南漢德陵、康陵發掘簡報〉，《文物》2006.7: 4-25。

2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銖積寸累——廣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選萃》（北京：文物出版

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

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知制誥上柱國范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臣盧應奉勅撰并書。

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二十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粵光天元年九月壬午朔二十一日壬寅遷神于康陵，禮也。符卯金而叶運，紹斬蛇（蛇）之開基。覆同軋（乾）建，載並坤維。法成周而垂範，稽世祖而作則，構大業而云終，偃巨室而不惑。嗣主仁孝，僂俛祚階，抑情登位，感結疚懷。動遵遺詔，詎隳俄頃，六府三事，肅然修整，億兆乂謚，家國鍾慶。痛深茹慕，啓引神臯，銜恤頒詔，命臣摘毫。伏惟高祖天皇大帝，日月孕靈（靈），星辰誕聖，爰本玄符，式隆景命。經天緯地，武庫文房，槎堯拍舜，邁禹超湯。君臨萬國，星躔三紀，四海鏡清，九州風靡。開物成務，知機其神，光宅寓縣，司牧蒸民。惠施五車，葛洪萬卷，聽朝之餘，披覽罔倦。損益百氏，笙簧六經，東西飛閣，周孔圖形。命鴻儒以臨蒞，選碩生而館校（校），鄙束皙之補亡，陋鄭玄之成數（效）。奮藻兮魏文收（收）譽，揮毫兮齊武藏名。品量舛謬，別白重輕，禁暴戢兵，謳詞獄訟。龍韜虎韜，七擒七縱。扼腕北顧，中原多事，吊伐在懷，未伸睿志。炁炁王業，巍巍皇猷，三王可擬，五帝難儔。天縱聰明，凝情釋老，悉筵淵（淵）微，咸臻壺奧。譚玄則變化在手，演釋乃水月浮天。神遊閬苑（苑），智洞竺軋（乾）。若乃陰陽推步，星辰曆數，仰觀俯察，罔失常矩。此外留情藥品，精究醫書，或南北臣庶，或羽衛勤劬。疾瘵所縈，御方救療，名醫拱手，稽顙神妙。將聖多能，視民如傷，朝野扞蹈，億兆懽康。多才多藝，允文允武，戡難夷凶，櫛風沐雨。嗚呼哀哉！天機秀異，韞藉風流，繕營苑（苑）圃，想象十洲。鶴立松巔，鸞穿花塢，水石幽奇，樓臺迴彩。萬機之暇，翠（翠）華爰處，花朝月夕，嬉遊輦路。災纏陽九，不裕中春，鍼石藥餌，備盡精臻。晨昏問豎，拱默而退，有加無瘳，導揚遺制。爰命嗣王，守位承祧，彝倫弗紊，祖述唐堯。遠法成周，近遵孝惠，懿範具存，丕訓罔替。中外庶務，悉稟謨猷，嗚呼哀哉！玉音在耳，大漸彌留。億兆號天，若喪考妣，攀髯不及，摧頽而已。叶從龜筮，先遠有期，玄宮將闕，龍輶在茲。休列耿光，與天攸（悠）久，刻諸貞珉，萬年不朽。其詞曰：

帝堯貴胄，豳龍受氏，豐沛建旗，南陽崛（崛）起。代不乏聖，軋（乾）亨紹位，澤被八埏，鏡清三紀。其一。開物成務，知機其神，龍飛紹漢，虎視窺秦。勵（厲）兵餽（秣）馬，睿志未伸，梯山航海，募義歸仁。其二。嚴

敬在躬，先敦柴燎，列聖立祠，禮同九廟。祖考來格，靈鑒洞照，美矣孝思，光遠有耀。其三。鑽研百氏，蹂躪六經，對峙飛閣，周孔圖形。乙夜披覽，循環罕停，群儒惕息，悚懼靡寧。其四。王業艱難，開基定霸，櫛風沐雨，早朝晏罷。經營四方，牢籠九野，事出機先，策無遺者。其五。損益三代，商較百王，重輕黍累，剖折毫芒。風馳雄辯，電疾雌黃，至鑿罔測，至智難量。其六。浮聖多能，博（博）通術數，君臣藥品，陰陽推步。太史膽摺，和緩色沮，宣召數馭，拱默無語。其七。聖文英武，帝業王猷，黃石三略，洪範九疇。志期席卷，牧馬休牛，睿志未就，大漸彌留。其八。嗚呼哀哉！逸致高情，風流韞藉。齊武藏名，魏文減價，不世英才，挺生王霸。青史已編，淺辭（辭）曷寫。其九。嗚呼哀哉！龍輻啓引，將闕玄宮，式揚文德，爰紀武功。福流嗣主，車書混同，刻石獻頌，永播無窮。其十。

此碑自大有十五年（942）³隨葬後，歷宋、元兩代未見著錄，可知康陵保藏狀況良好，未曾遭發現、盜掘，直至明末。時人黎遂球（1602-1646，字美周，廣東番禺人）撰《蓮鬚閣集》（清康熙間黎延祖刻本），中有〈弔南漢劉氏墓賦並序〉和〈觀劉氏塚記〉兩文，是目前所知關於該墓和碑的最早紀錄。〈弔南漢劉氏墓賦序〉記崇禎九年（1636）劉襲墓被發現經過：

予家板橋，對岸有洲名北亭，當五羊城之東，疑即昌華苑地，先人有田在焉。崇禎丙子秋，田間有雷出，奮而成穴。耕者梁父過而見之，因投以巨石，空空有聲，乃內一雄雞其中，自伺守，至夜盡，聞雞鳴無恙。於是率子弟入，將大發之，見有金人如翁仲之屬者凡數，舉之各重十五、六斤。其正處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六十斤。地皆金蠶珠貝築之。有鏡一，自發光，燭炤暗中如白日。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動。其他異物尚多，不可指識。但先攜鏡歸家，光動鄰舍，亟碎之，鄰人覺而爭往。遂趨白官邑，有司并拘繫之，亟親臨其地視，搜發一旦，公私籍沒無餘。其中一棺即為掘者所糜，骨齒稍有存者。今其穴故在，碑文隱隱可讀，蓋南漢劉氏塚也。⁴

〈觀劉氏塚記〉重點提到了墓中的碑：

予自小時從仙城往還于板橋，所過洲嶼峙。南海神廟之西南有所謂北亭南亭者，習傳之而不知其所繇名。比赴公車，在都門聞鄉人後來者稱，劉鋹先墓

3 大有為南漢高祖劉襲年號（928-942）。

4 明·黎遂球，〈弔南漢劉氏墓賦並序〉，《蓮鬚閣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8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1，頁30-31。

爲耕者所發，事甚奇。因輒以其語述爲賦，弔之。既罷。歸，相與乘舟往而縱觀焉。其藏已空，淤泥之所匯，蛙蠹蛇蚓之所與處，石斷裂從衡而臥，立於艸潦者不知凡幾。有碑一猶在，稱爲〈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袋臣盧應勅撰并書。其所爲大帝者，崩于歲壬寅四月甲寅朔越廿四日丁丑，號爲大有十五年，葬以元光元年，稱康陵。⁵

黎氏以後，著錄較多。番禺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又字介子，廣東番禺人）《廣東新語》卷19〈墳語〉記「劉襲墓」，較爲詳盡，內容大致相同。⁶二氏所錄的劉襲墓即今考古發掘之康陵，「哀冊文」即上錄之〈哀冊文〉。黎是明末有名的文人、志士，大均生於崇禎三年（1630），康陵被盜時年方六歲。從摘錄的碑文看，《廣東新語》的記載應該是參照了黎氏的《蓮鬚閣集》。

黎、屈二氏外，朱彝尊（1629-1709；《曝書亭集》卷47）、徐乾學（1631-1694；《讀禮通考》卷90）、王士禎（1634-1711；《皇華紀聞》卷4）、翁方綱（1733-1818；《粵東金石略》卷1）、吳蘭修（1789-1839；《南漢金石志》卷1）等人也有著錄，其中吳氏最晚出。他們均按金石學習慣稱「康陵碑」。從其著錄的文字看，僅錄碑文的開首部分，可以看出它們之間是輾轉抄襲的，而其藍本又不盡可靠。但據其所錄，當和黎、屈氏所記是同一塊無疑。至吳蘭修撰《南漢金石志》，因爲是最晚出，雖對幾家說法都有照錄，但考據僅聊聊數語。⁷如果比勘碑刻實物，可以發現其中著錄上的問題：《南漢金石志》所據，是《曝書亭集》；而朱彝尊所據，據〈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是他在光孝寺時聽陳元孝所說，而陳元孝又是憑藉記憶。⁸《皇華紀聞》所錄，也是聽聞而已。⁹由此可見，朱、王、翁、吳各家都不曾親睹康陵原碑，而轉相抄錄，其中錯訛之處明白無誤。屈大均也是不曾親

5 黎遂球，〈觀劉氏塚記〉，《蓮鬚閣集》，卷16，頁215。

6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9，頁495-496。

7 清·吳蘭修，《南漢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卷1〈康陵碑〉，頁384-385。

8 清·朱彝尊，〈跋五·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曝書亭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257冊別集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47，頁178-179。

9 參見清·王士禎，《皇華紀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5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卷4〈劉襲塚〉，頁229。

睹。唯一目睹原碑的，應是黎遂球。

三、考 釋

南漢初號「大越」，歷時僅一年（即乾亨元年，當後梁貞明三年，917年）。翌年改國號「漢」。¹⁰ 在五代十國中屬於國祚較長者（917-971）。¹¹ 因偏處嶺南，與中原很少溝通，新、舊《五代史》及《宋史》等正史及《資治通鑑》中對其記載簡略，而《九國志》（宋·路振撰）、《東都事略》（宋·王稱撰）、《吳越備史》（宋·錢儼撰）、《五國故事》（宋·佚名撰）、《續通志》（清·嵇璜、劉墉等奉敕撰）、《廣東通志》（清·魯曾煜等編纂）、《南漢書》（清·梁廷枏撰）、¹²《南漢春秋》（清·劉應麟撰）、《十國春秋》（清·吳任臣撰）、《南漢紀》（清·吳蘭修撰）等史志雖記載較詳，卻因史料來源和編史旨趣、時間等問題，今天來看缺憾固然不少。正因此，此〈哀冊文〉作為當時留存下來的文獻，就顯得彌足珍貴。作為一種與傳統喪葬制度有關的誄碑「文本」，哀冊文的史料價值自不待言，它按此類文章傳統概述了劉龔一生行跡，其中涉及他個人生活的一些方面，是正史沒有或者很少記錄和注意的；此外，還涉及南漢哀、謚冊制度和宗廟制度，以及撰者盧應（?-958）的史料。就此碑而言，過去諸家考證工作，因為錄文都來自傳說、記憶，而

10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135〈僭偽列傳二〉，頁1808：「梁貞明三年八月，陟乃僭號於廣州，國號大漢，偽改元為乾亨」。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65〈南漢世家〉，頁811：「貞明三年，龔即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270〈後梁紀五〉，頁8817、8836：貞明三年八月，「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貞明四年冬十一月，「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另參見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64），卷39〈劉氏據廣州〉，頁3679-3680。

11 宋·路振，《九國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33冊別史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卷9〈南漢臣傳〉，頁310：「南漢。唐天祐元年，烈宗為廣州節度使，至後主大寶十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斷自高祖乾亨元年為始，凡四主寶五十五年」。路氏此說，以為劉氏的割據廣州實際從劉隱（烈宗）已經開始形成，未曾稱帝而已。

12 梁廷枏另撰有《南漢叢錄》二卷及《南漢文字略》四卷，見《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334冊別史類，頁1-242。

且只錄〈哀冊文〉的開頭，爭論也在劉襲下葬時間和撰者盧應¹³兩個問題上面，現在據原碑比照，其舊問題已昭然若揭，而新問題也相應而生。以下試就冊文所反映的幾個問題作一考證。

(一) 南漢哀、謚冊制度和廟制

帝王之死，用於哀悼、追念的文本有二套：哀冊（又作「哀策」）與謚冊（又作「謚策」）。爲上謚還有「謚議」。此制度之始尙待研究。《太平御覽》〈弔文〉引《文章流別傳論》：「今所哀策者，古誄之義」。¹⁴屬於高級別的誄文。哀、謚冊並用且專用於帝王、太子、太后等，是較後的制度。韋昭（204-273）《辯釋名》說：「古者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賜謚。惟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子謚其君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¹⁵是謚制起源於先秦，用於天子和諸侯，但謚策情況不明。

哀策之制較後出現。據史書，漢代哀、謚冊制度前、後有所變化。前漢似無哀冊制度，但有謚冊，稱「謚誄策」，從屬於謚法，用於諸侯王和列侯，分別由大鴻臚和大行撰寫、上奏。¹⁶史載後漢哀、謚冊制度，哀、謚冊及「皇帝次科」是分開入藏的：「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

13 〈哀冊文〉撰者盧應的銜名不合問題，朱彝尊、翁方綱曾有懷疑，參見朱彝尊，〈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曝書亭集》，卷47，頁178-179；清·翁方綱，〈光孝寺鐵塔識〉，《粵東金石略》（《石刻史料新編》第17冊地方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卷1，頁12373-12374。《十國春秋》〈南漢列傳〉說盧膺高祖時任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太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乾和（中宗年號）十五年冬卒於官（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64，頁903）。梁廷枏《南漢書考異》〈盧膺傳〉據此與《曝書亭集》、《皇華紀聞》、《粵東金石略》考證，以爲〈康陵碑〉撰者盧應有兩個名字（應初、應敕），而與史載之盧膺爲同一人（清·梁廷枏，林梓忠校點，《南漢書·南漢書考異》，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卷12，頁168-169）。《蓮鬚閣集》以來諸書所著的「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袋」，與原碑差別大，可以推斷各氏著述皆是轉相抄襲，而藍本無疑是美周的《蓮鬚閣集》。黎氏當年攜友往觀康陵墓穴、碑刻時，僅是一般觀光，對碑文未做拓錄，回去後得憑記憶寫此遊記，故於盧應官職上多有錯誤。

14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596〈文部·弔文〉，頁2687。

15 《太平御覽》卷562〈禮儀部四十二·謚〉說是出自《釋名》，今據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6〈釋典藝〉，頁318，考證爲出自韋昭之《辯釋名》。

16 宋·徐天麟，《西漢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卷20〈禮十五·凶禮〉，頁181：「孝景中二年令：諸王薨，大鴻臚奏謚誄策；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

史奉哀策葦篋詣陵」。¹⁷ 哀、謚策之形制，由其從「策」字以及漢代書寫體制看，是採用竹簡。哀冊用於皇帝；謚冊既用於皇帝，又用於諸侯王、列侯。魏晉以來哀、謚冊制度發生大變化。《左傳》「莊公元年」孔穎達疏：

魏晉以來，唯天子崩乃有哀策，將葬於是遣奠讀之，陳大行功德，敘臣子哀情，非此類也（案指「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之「錫命」——引者）。人臣之喪不作哀策。良臣既卒，或贈之以官，褒德序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告柩，如今哀策蓋此謂也。¹⁸

是只有天子有哀策。人臣中的良臣死後受褒獎贈官，也可以載之以誄文，葬禮時「告柩」（當棺宣讀），也是一種哀悼之策。唐時延續此法，但此種策在形制上應與天子哀策不同。

唐代哀、謚冊制度，據史載看，皇帝有哀冊、謚冊、謚議，哀冊、謚冊以及一種「寶綬」與幣、玉一道隨葬；¹⁹ 個別皇太后（代宗皇后沈氏）、皇后（武則天）、追謚皇帝有謚冊，入藏陵廟或太廟。其文本之撰者，一般都是當朝重臣和名士「詞臣」（如高祖之虞世南，太宗之褚遂良，武則天之崔融）。至文宗時始成定制，分別由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和太常（少）卿或禮部侍郎撰寫。²⁰ 根據考古資料，某些特別背景的太子（懿德太子、節愍太子等）和「讓皇帝」（李憲），也隨葬有哀冊或哀、謚冊。²¹ 唐代哀冊形制呈玉質板狀，稱「玉冊」（謚冊同形制）。哀冊文字數長，謚冊文字數較少，採用四六體駢文，哀冊文前序後詞。「謚議」為上謚之奏議。

五代禮制是晚唐之餘續，在哀、謚冊及宗廟制度上有反映。五代帝陵，據記載來看都有哀冊、謚冊和「謚議」，分別由當世重臣、文人（「詞臣」）撰

17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96〈禮儀志下〉「大喪」，頁3145。

18 晉·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8〈莊元年盡十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1762。

19 參唐·杜佑撰，王文錦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86〈禮四十六·凶禮八〉，頁2349。

20 參見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卷1、2〈帝號〉，頁1-22。

21 參見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唐懿德太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7: 26-32；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富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唐節愍太子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143-159；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憲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頁224-269。

寫，延續了唐文宗以來的定制，其撰者分別由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和太常（少）卿或禮部侍郎擔任。²²案《舊五代史》〈禮志下〉，後唐天成三年（928）十一月為定唐少帝諡、廟號問題，博士呂朋龜奏議：

……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僚奉諡冊告天於園丘，迴讀於靈座前，並在七月之內，諡冊入陵。若追尊定諡，命太尉讀諡冊於太廟，藏冊於本廟。²³

又據《五代會要》〈帝號雜錄〉：

晉天福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山陵禮儀使狀：「高祖尊號諡及廟號，伏准故事，將啓殯宮前，擇日，命太尉率百僚奉諡冊，告天於園丘。畢，奉諡冊跪讀於靈前。此累朝之制。……」²⁴

除此外，至少後唐、後晉還有「諡寶」。²⁵五代諡冊形制應為玉冊。諡寶與諡冊一道入陵廟冊告後藏入陵中。

據考古發掘的五代十國陵墓資料，其哀、諡冊情況有所不同，在前蜀王建墓是隨葬玉哀、諡冊和諡寶，諡寶形制與玉璽相同，上篆刻大行皇帝諡號，盛於寶盃中；²⁶南唐欽、順二陵也分別隨葬玉、石質的哀冊。²⁷而南漢劉龔墓則以石碑刻寫哀冊文，更接近墓誌的形制，至於諡冊、諡寶的情況則不可得知。由此可以看出南漢哀、諡冊制度與眾不同之處，即與後世宋代哀、諡冊制相比也不相類。個中原因值得推敲。

南漢宗廟制度，據此〈哀冊文〉也可顯露一二。《資治通鑑》記：貞明三年（917）八月，劉龔²⁸即皇帝位，「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

22 參見宋·王溥，《五代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78），卷1〈帝號〉，頁1-9。

23 《舊五代史》，卷143〈禮志下〉，頁1916。

24 《五代會要》，卷1〈帝號雜錄〉，頁7。

25 《舊五代史》，卷33〈唐書九·莊宗紀〉，頁458：「丁卯，奉皇太后尊諡寶冊赴西宮靈座，宰臣豆盧革攝太尉讀冊文，吏部尚書李琪讀寶文，百官素服班於長壽宮門外奉慰」。「諡寶冊」即諡冊和諡寶，可能都是玉制，分別由太尉和吏部尚書宣讀於靈堂樞前。《舊五代史》，卷81〈晉書七·少帝紀〉，頁1072：「甲辰，上大行皇帝尊諡寶冊」。

26 馮漢驥，《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頁42。

27 宿白，《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大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425-427。

28 清·梁廷枏著，林梓忠校點，《南漢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卷2〈高祖紀一〉，頁5：「高祖天皇大帝，初名巖，更名陟，復名巖，改名龔，終名龔」。

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²⁹這是開國時所立的宗廟。烈宗之後，又加高祖、中宗二廟，是截至南漢國亡共立五廟。與歷代四、六、七廟制及五代廟制相比都不同（後梁四廟，後唐七廟，後晉四廟，後漢六廟，後周四廟）。³⁰因為其祖父以上已不清楚，實在無可追尊立廟者。諸史所紀南漢世系，也只是追述到祖父一輩。這一點頗值得懷疑。

南漢祖宗廟號序列，整體上看是參照了唐制。³¹按「祖其有功，宗其有德」的原理，劉龔廟號「高祖」是祖其有建國之功，劉隱廟號「烈宗」是宗其臨終舉薦劉龔為留後之德。這樣套用雖然也符合原理，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因為劉隱屬於追尊，時間又在前；劉龔是開國之君，立廟時間在後。「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至當不易之理也」。³²這個兄弟昭穆問題雖然可以解決，但另一方面，參照祖功宗德原理，元和十五年（820）還發生了一場關於後世有功有德者「稱祖稱宗孰宜」的辯難，以「宜稱宗」為斷。³³如依此制，劉龔兄弟宗廟同昭穆，較合宜的辦法是廟號同稱「祖」，劉隱廟號稱「烈祖」。這個難題，雖是中國古代禮制的一個通病，³⁴但也反映出在中華

29 《資治通鑑》，卷270〈後梁紀五〉，頁8817。

30 參《五代會要》，卷2〈廟議〉，頁20-28。歷代廟制，四、五、七廟為常數，尤其七廟。

31 《通典》，卷47〈禮典七沿革七吉禮六〉，頁1315：「（開元）十年，制移中宗神主就正廟，仍創立九室。其後制獻祖、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太廟九室也」。

32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30冊禮類），卷59〈古禮·宗廟制度〉，頁363。另參見清·萬斯大，《學禮質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23冊禮類），卷2〈兄弟同昭穆〉，頁448-449。

33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25〈禮儀志五〉，頁958：「（元和）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諡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先是，河南節度使李夷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翦寇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正當決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也。』遂詔下公卿與禮官議其可否。」《唐會要》，卷15〈廟議上〉詳記王彥威的奏議：「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伏惟《禮經》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為先。故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于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至高宗以後則但稱宗，謂之尊名，著為成法。……』從之。」（頁329-330）這個辯難反映出廟號制度的問題。

34 徐乾學，《讀禮通考》〈葬考〉議南唐永陵的問題：「《玉壺清話》：南唐先主昇殂，尊諡曰孝高皇帝。議者以先主繼唐昭宗之後，號當稱宗。韓熙載建議以謂：『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今先主中興之君也，宜當稱祖』。眾

分裂、制度紛亂的時局下，南漢統治階層對規範禮制是較為生疏的。

又據諸史及〈哀冊文〉，劉龔殂後諡號「天皇大帝」，廟號「高祖」。諡號與唐高宗相同。³⁵ 這個諡號不遵傳統諡法，而充滿玄機。劉龔諡號當仿效於茲。案《史記》〈五帝本紀〉鄭玄注：「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³⁶ 《舊唐書》〈禮儀志〉記垂拱元年（685）有司議圓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昊天之神，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³⁷ 「昊天上帝」是歷代最高崇祀之神，祭祀於南郊之圓丘（圓形祭壇）。高宗這個諡號出自武則天旨意，雖為御用儒生加以理論上的圓通，但將人君與天神相類，無論如何也是個千載的異數。時隔二百多年，又為南漢劉氏所借鑒，由此可窺見其心態之一斑。

（二）劉龔的生平事蹟

在將〈哀冊文〉與有關劉龔、南漢諸史記載相比對時，識者可以發現這兩種文本之間的差異，本身即是一個中國史及其史學的大問題。關於劉龔生平主要事蹟及性情等方面，史乘所記、評價，以「僭偽」、殘暴（酷刑）、奢靡（大興宮闕園囿）為基調。具有代表性的，是清儒吳任臣撰《十國春秋》〈南漢本紀〉裏的「論」：

予采南漢逸事，至先主每視殺人不勝其喜，復創為水獄、湯鑊、鋸解、剝炙之刑，不禁掩卷歎曰：《十國世家》有云，「牢牲視人，嶺蜒遭劉，豈虛語哉！夫時當五季，中原迭變，民不聊生，困已極矣。區區廣南之地，不務施德，而虐及無辜，將天不厭亂，特假手以毒此一方民邪？不然，傳國三世，卜年六十，吾不能為彭城氏解矣。³⁸

是之。遂上廟號曰烈祖，陵曰永陵」。清·徐乾學，《讀禮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08冊禮類），卷90〈葬考九〉，頁189。

35 高宗生時與武則天一起受尊號「天皇」、「天后」。《舊唐書》，卷6〈則天皇后本紀〉，頁115：「永徽六年，……高宗稱『天皇』，武后亦稱『天后』。時稱「二聖」，死後諡號「天皇大帝」、「則天大聖皇后」等。

36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1〈五帝本紀〉，頁25。

37 《舊唐書》，卷21〈禮儀一〉，頁828。

38 《十國春秋》，卷58〈南漢一〉，頁850。

這類史論和史觀，「僭偽」加殘暴加奢靡必致國祚短促，包含著歷史思維的一套因果律，折射著傳統史家的立場，也使問題模式化。如與事主自身的文本比較，則可以反觀出若干的視點。

旨在歌功頌德的〈哀冊文〉，採用四六體誄文形式，在贊詞裏概括、總結了劉龔生平之業績、才能和性情，分為八個方面：其一，開國創業之功；其二，北伐中原之志；其三，崇祀先祖列聖；其四，在百家學說和儒學經典上有造詣；其五，勤理朝政，治國有方；其六，富於機智明辨之才幹；其七，精於醫藥卜筮術數；其八，治國安邦有謀略、大志。另在序文裏，除此八方面外，劉龔之其他業績、才能、性情也一併給予了謳歌。我們發現，在某些視點上（如最敏感的「僭偽」與「暴君」問題），〈哀冊文〉似乎在為未來的史筆預備一套「辯詞」，至少在客觀上發揮了這個作用。以下就〈哀冊文〉所述劉龔的事蹟、才能、性情之主要方面，結合史乘諸說給予討論。

1. 追尊先祖與「僭偽」問題

冊文的序與詞一開始就敘述兩漢創始典故，將「豐沛建旗，南陽崛起」與自身相附會，其手法與李唐自稱西涼王族後裔如出一轍，³⁹也是五代十國的範例，這一點十分明顯。在〈哀冊文〉序裏提到了「符卯金而叶運，紹斬蛇之開基」的符命，以「卯金」（劉）、「斬蛇開基」應徵劉龔在嶺南開國。南漢皇族追尊先祖的用意，除了自抬身價、標榜血統以與中原敵手抗衡外，實際上還暗含著祖先血統的問題（此說詳下文）。

據劉龔開國時只立三廟及諸史所記僅追述到祖父一代，這與〈哀冊文〉追尊先祖至「斬蛇開基」的說法，必然產生難以調和的矛盾。作為〈哀冊文〉作者的盧應及南漢文人，對其中名堂必然也心知肚明。作為隨葬墓中的誄文，〈哀冊文〉的目的與一般的墓誌相同，對血統加以粉飾，是出於現實意識形態需要而創作的文本之一種，也與後世史家必然的「僭偽說」相抗衡。這樣造說，反映出一種微妙的心態。

案五代十國是正統史家斥為「僭偽」的時代，為求國祚的合法性，新崛起政權中的李、劉氏皇朝都採取追尊祖先的策略，從其宗廟上可以窺出一

39 參見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三論李唐氏族問題〉，《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320-352。

二，如後唐七廟中追崇高祖、太宗並升級懿宗爲祖，及後漢立六廟（高祖、光武和四親廟）之手法。與之相比，南漢在宗廟上卻未採取相似做法，追崇高祖、光武帝。這一點的確奇怪。所謂追崇，也只是埋葬墓中的一個文本。所以，我們可以發覺其中的微妙之處：這種追崇先祖的伎倆，在劉龔更是一種策略、手腕，在客觀上也與其「北顧中原」之「睿志」起到了呼應的作用。

2.關於「北顧中原」

冊文說劉龔「扼腕北顧，中原多事，吊伐在懷，未伸睿志」。後句贊詞又說「龍飛紹漢，虎視窺秦，勵（厲）兵誅（秣）馬，睿志未伸」。似乎是雄心勃勃的一方豪傑，欲以嶺南的勢力而北伐中原、入主中國。「梯山航海，募義歸仁」是說他的招攬人才的努力，使天下英雄競相歸附，大約也是爲了配合他的「北顧中原」。⁴⁰這大概是他的一個未曾付諸行動的計畫，在史書中也有線索。

《舊五代史》〈僭偽列傳〉記劉龔「及聞錢鏐冊封吳越王，陟恥稱南海之號，乃歎曰：『中原多故，誰爲眞主，安能萬里梯航而事僞庭乎！』」於是稱帝。⁴¹史筆的這種說法雖然老套，但也可昭示在「中原多故」的時局下，「眞主」以及中原是各方力量覬覦的對象，對「僭主」劉龔而言也不例外。這裏又涉及到他的身世問題。《東都事略》說：劉龔「見北人必自言世居咸秦，恥爲南蠻主。呼中朝天子爲洛州刺史」。⁴²在態度上既卑且亢，史論以爲他「妄自尊大，皆此類也」。《吳越備史》記載後唐同光三年（925）春二月，「南海入賀京師，上書自稱『大漢國王』」。⁴³此事在兩《五代史》中記載較詳，《冊府元龜》、《續通志》等中也作備錄。⁴⁴使節的目的是窺探後唐

40 《新五代史》卷 65〈南漢世家〉記劉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士人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頁 810）據〈哀冊文〉可知，這個人才南下狀況延續到了劉龔統治時期。

41 《舊五代史》，卷 135〈僭偽列傳二〉，頁 1808。

42 宋·王稱，《東都事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140 冊別史類），卷 23，頁 162。

43 宋·錢儼，《吳越備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222 冊載記類），卷 2，頁 536。

44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232〈僭偽部·稱藩〉，頁 2764；清·嵇璜、劉墉等，《續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卷 598〈載記五·南漢〉，頁 6579。

虛實，因為聽說莊宗「兵威甚盛」，擔心其征伐，可能也有為「北顧中原」搜集情報的任務。但這個「睿志」未曾付諸實踐，在〈哀冊文〉裏明確地交代了。

3. 禮制與文化建設

南漢的禮制，原能夠反映這個南疆獨立政權與傳統文化的關聯，但史書中嚴重闕載。《舊五代史》記劉龔登基後第二年「僭行郊禮」。⁴⁵「祀天南郊」即天子祭天之禮，也是皇帝登基禮，這個做法表明他遵循的是傳統禮制。案〈哀冊文〉所頌「嚴敬在躬，先敦柴燎，列聖立祠，禮同九廟」。「柴燎」（燔祭）是傳統的祭法；「九廟」是唐天子宗廟之制，這裏是延用的說法，贅述他為祖先、列聖建立祠廟以崇祀的禮制建設。「列聖」之說，可能指中原傳統國家崇祀系統中的諸神祇。不過，據記載劉龔於開國時所建只有三親廟（詳前述），在廟制上他的做法的醒目之處，在於雖追尊祖先到漢高祖、光武帝，但在宗廟上卻不予實際的崇祀。這是通過〈哀冊文〉的文本可以察覺到的微妙之處。

劉龔的禮制建設，所倚賴的是北方來的士人。因為唐末以來有成批的避亂逃亡嶺南的中原等地士人，「梯山航海，募義歸仁」，受到劉謙父子的招撫，這些士人中有熟諳中國傳統禮制者，會參與南漢的政權和禮制建設，如哀、謚冊和廟制，就是一個說明。但作為武夫出身的一方雄主，這些文人對他的影響力實際也會有限度。由〈哀冊文〉帶有諛詞色彩的描述可以看出，劉龔曾用心於傳統文化並有一定的造詣，這使他採取了自負甚或挑戰的姿態（「命鴻儒以臨蒞，選碩生而雝拔（校），鄙束皙之補亡，陋鄭玄之成敷（效）」），令人玩味。

據〈哀冊文〉，劉龔的文化建設，集中於圖書典籍的編訂校勘上。所謂「東西飛閣」可能是他專門建造的藏書樓，或許在甘泉宮內。他延攬一些文人編訂圖書典籍，從事校勘，想在文化建設上有所作為。另一項文化建設舉措，是在南漢推行科舉制。⁴⁶這種事情會得士人的歡心，所以在史書裏也有載記，冊文裏所說的「選碩生」可能與之有關。

45 《舊五代史》，卷 135〈僭偽列傳二〉，頁 1808。

46 《新五代史》，卷 65〈南漢世家〉，頁 812：「（乾亨）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為常」。

憑藉自祖父以來在嶺南地區積累起來的勢力，劉龔在亂世環境下終於建立一個皇朝而「登立為帝」，其路數、追求，對他個人來講難免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即使一個「蠻夷之主」也深受感染。冊文在概述他一生輝煌業績時，作為傳統文人的作者盧應，特別吹捧了劉龔的文化追求及其主持下的文化建設工程。這種本屬中國政治傳統的行為，在嶺南地區別有深意。這一點使人聯想到其血統上的問題。這一史實在〈哀冊文〉中得到竭力宣揚，應有其深意在焉。

案劉龔的文化追求和建設，在史書當中闕載，而竭力陳述其暴行的一面，其原因固然是出於史家的傳統心態。這一點恰與〈哀冊文〉裏竭力表達的形成鮮明對比。史家可以因為其「僭偽」而渲染其殘暴，反過來也可以因為其殘暴而證明其僭偽，這裏面包含著憎惡的情緒和對「僭偽」的南漢的看法；但在當世文獻的〈哀冊文〉，卻通過宣揚「暴君」的文化功績以粉飾歷史。

4. 興建宮殿苑林

冊文說其「繕營苑囿，想象十州。鶴立松巔，鸞穿花塢。水石幽奇，樓臺迴彩」。《舊五代史》只記玉堂珠殿一座，⁴⁷《新五代史》載作南宮一座，⁴⁸吳蘭修《南漢紀》記乾亨四年（982）建成文德殿。⁴⁹可能其早年尚算是節儉，而晚年則大肆興建宮殿苑囿沉湎其中。《資治通鑑》〈後晉紀四〉：

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⁵⁰

《五國故事》：

巖暴政之外，唯以治宮殿為務，故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瓌麗。昭陽殿以金為仰陽，銀為地面，簷楹棖桷亦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珍

47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135〈僭偽列傳第二〉，頁1809：「（龔）惟厚自奉養，廣務華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嶺北行商，或至其國，皆召而示之，誇其壯麗」。

48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65〈南漢世家〉，頁812：「（乾亨）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

49 清·吳蘭修，《南漢紀》（《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34冊別史類），卷2〈高祖紀〉，頁253。

50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83，頁9236。

珠；又琢水晶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二樓之上，巖親書其榜，以見。進士王宏昭陽殿賦詞之，越人皆非虛也。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⁵¹

陶穀《清異錄》〈居室門〉：

廣府劉龔僭大號，晚年亦事奢靡，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香，故有氣無形，嘗謂左右：「隋帝論車燒沉水，卻成籠疎，爭似我二十四箇藏用僊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流天子。」⁵²

方信孺《南海百詠》和王象之《輿地紀勝》都提到南漢所建的「劉王花塢」，⁵³又有避暑勝地的「甘溪」，⁵⁴以及建在「荔枝洲」上的「昌華苑」，⁵⁵雖不一定是劉龔所建，但據《新五代史》所說，至其子劉晟時，已有數百座宮殿。⁵⁶他在這些宮苑間穿梭，正是「萬機之暇，翠華爰處，花朝月夕，嬉游輦路」的「風流天子」景象。這些記載顯示了劉龔生平的一大事蹟：晚年大肆興建宮殿園林。可能是在「北顧中原」之夢破滅之後，開始移情於宮苑，這個喜好在嶺南植物王國正是得其所哉。而在中原史家看來，這種宮苑之樂正是「蠻夷之主」的本色了。這個史實於〈哀冊文〉中得到驗證。

（三）劉龔的才能、性情與信仰傾向

冊文中說：劉龔「天縱聰明，凝情釋老。悉籛淵微，咸臻壺奧。譚玄則變化在手，演釋乃水月浮天。神遊閬苑（苑）」，智洞竺乾」。表明他對道教、佛教有興趣，且在玄學（應指道教學說）、佛學上有修養。「惠施五車，葛洪萬卷」雖是諛詞，但也是個說法，前者說他對名辯之術的興趣，即贊詞說的「風馳雄辯，電疾雌黃」；後者與道教有關，但與他的醫藥技術混在一起。關於劉龔的信仰在史書中雖缺乏記載，但據冊文可以發覺他的個人趣味

51 宋·佚名，《五國故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222冊載記類），卷下，頁214-215。

52 宋·陶穀，《清異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353冊），卷下，頁893。

53 宋·方信孺，《南海百詠》（清·阮元輯《宛委別藏》第10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頁31-32；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89，頁2850。

54 宋·方信孺，《南海百詠》，頁37-38。

55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89，頁2846。

56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65〈南漢世家〉，頁816：「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

影響下的信仰傾向，在於道教和佛教。如果與〈哀冊文〉贊詞裏的說法「多才多藝，允文允武」聯繫起來，則可看出他的宗教興趣也僅僅是其眾多才藝裏的一種而已。

據《南漢金石志》中著錄的大寶元年（958）〈雲門山匡真大師塔銘〉和大寶七年〈匡聖宏明大師碑銘〉，碑文中有涉及劉龔和匡真大師的一段交往：

……至戊寅，高祖天皇大帝巡狩詔石，幸於靈樹……於時詔師入見，特恩賜紫，次敕師於本州廳開堂，師於是踞知聖筵。……至戊戌歲，高祖天皇大帝詔師入闕，帝問：「如何是禪？」師云：「聖人有問，臣僧有對。」帝曰：「作麼生對？」師云：「請陛下鑒臣前語。」⁵⁷帝悅云：「知師孤戒，朕早欽敬。」宣下授師左右街僧錄，師默而不对，復宣下，左右曰：「此師修行，已知蹊徑，應不樂榮祿。」乃詔曰：「放師歸山可乎？」師欣然，山呼萬歲。翌日，賜內帑香藥，施利鹽貨等迴山，并加號曰「匡真」。厥後每年頻降頒宣，繁不盡記。⁵⁸

這段話顯示出劉龔對釋教的關注，而從他和匡真大師的對話也可以看出他的禪學修養。

在宮城中有「三清殿」。《新五代史》〈南漢世家〉：「（乾亨）九年，白龍現南宮三清殿，改元曰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⁵⁹至少這座殿的名稱帶有道教的味。冊文中有「神遊閬苑」之說，可見他是有道教的興趣。據方信孺《南海百詠》，其中多詠南漢故跡，「番山」條：

國初前攝南海簿鄭熊所作《番禺雜誌》云，番山在城中東北隅，禺山在南二百許步，兩山舊相聯屬，劉龔鑿平之，就番積石為朝元洞，後更名為清虛洞，而以沉香為臺觀於禺之上。⁶⁰

這座「清虛洞」，可能是一所道觀。

史書所記劉龔的才能、性情極其簡略，《舊五代史》說「陟性雖聰辯，然好行苛虐」，《新五代史》說「龔性聰悟而苛酷」，在酷刑上有大發明，且

57 在〈匡聖宏明大師碑銘〉中，對話內容稍有不同：「（高祖）因宣問曰：『作麼生是本來心？』師曰：『舉起分明。』帝知師洞韞元機，益加欽敬」。清·吳蘭修，《南漢金石志》，頁399。

58 《南漢金石志》，頁388-389。

59 《新五代史》，卷65〈南漢世家〉，頁812。

60 《南海百詠》，清·阮元輯《宛委別藏》第104冊，頁1-2。

「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朵頤，垂涎呀呷，人以為真蛟蜃也」。⁶¹各史在此方面都無例外地予以渲染，其中原因有他「僭偽」之故，但嗜血變態狂的描述也令人心生疑竇：傳統史筆為何對「僭主」或「暴君」都作如是描述？此中真相如何？

在「暴君」劉龔的〈哀冊文〉裏，我們讀到的是「將聖多能，視民如傷，朝野拊蹈，億兆懽康。多才多藝，允文允武，戡難夷凶，櫛風沐雨」的美譽。一方面是殺人如麻的變態狂，另一方面是拯民水火的救世主，這兩套文本恰又形成鮮明對比，由此彰顯的問題，是否可以用〈哀冊文〉是粉飾暴君其結果欲蓋彌彰來解釋？其中是非曲直，恐怕永無澄清之望。〈哀冊文〉的價值，是在此問題上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套解說的文本，儘管也有難解之處。在動亂年代崛起的地方豪傑，身上都帶有強暴之氣，這一點也可理解。

據冊文，劉龔的本事，盡體現在「博通術數」上。一個是在卜筮方面：「若乃陰陽推步，星辰曆數，仰觀俯察，罔失常矩」。「陰陽推步」是指其對《易》的興趣，從其年號上可以得到體現。⁶²「星辰曆數」是天文曆法的學問，大約他學習來用於占星。二是在醫藥技術方面。《粵東金石略》提及劉龔於藥洲專門修建宮觀聚方士、習丹鼎之術。⁶³據〈哀冊文〉中所吹噓，他是個精通醫藥的專家（「留情藥品，精究醫書，或南北臣庶，或羽衛勤劬。疾瘵所縈，御方救療，名醫拱手，稽顙神妙」）。這幾個方面的興趣、專長，反映出他個性中的一些傾向，大約就是所說的「性聰辨多權數」了。⁶⁴ 這樣

61 《舊五代史》，卷135〈僭偽列傳二〉，頁1808；《新五代史》，卷65〈南漢世家〉，頁811。

62 劉龔年號，據新、舊《五代史》、《資治通鑑》及〈哀冊文〉，依次為：

乾亨，凡9年（917-925）

白龍，乾亨九年（後唐同光三年）改元為白龍元年，凡4年（925-928）

大有，白龍四年（後唐天成三年）改元為大有元年，凡15年（928-942）

其中，「乾亨」、「大有」年號的來歷，都與《易》有關。「白龍」年號，據載是因為「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新五代史》，卷65〈南漢世家〉：劉龔「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采《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名焉。」（頁812）這個年號也與《易》有關。由年號來看，他對《易》的興趣混雜在術數和讖緯學說之中了。

63 清·翁方綱，《粵東金石略》附卷2〈九曜石考下〉，頁12458，引曹學佺《名勝志》云：「藥洲，在古甕城西。劉龔鑿長湖五百餘丈，以眾方士煉藥于此。」

64 參見清·梁廷柅著，林梓忠校點，《南漢書》，卷3〈高祖紀二〉，頁13。

一個「性聰悟」的暴君，在刑罰上自然是有創舉的。⁶⁵

四、南漢劉氏先祖血統和來源問題

南漢皇族劉氏的血統問題，日本學者藤田豐八（1869-1929）曾作〈南漢劉氏祖先考〉，認為劉氏乃阿拉伯人後裔。先是根據文獻中對南漢劉氏先祖的籍貫及其遷徙表示懷疑，進而根據《北夢瑣言》等對劉謙相貌的描寫，考定劉氏一族非華夏族，疑為入華大食人或波斯人後裔，其「劉」姓之對音疑為大食名Ala、Ali的音譯。⁶⁶

藤田之後，陳寅恪（1890-1969）考證唐劉蛻（字復愚，生卒年不詳）血統問題，其著眼點和藤田氏相同，就南漢劉氏血統問題也有涉及：

近年桑原鷺藏教授《蒲壽庚事蹟考》及藤田豐八教授〈南漢劉氏祖先考〉（見《東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皆引朱彧《萍洲可談》二所載北宋元祐間廣州蕃坊劉姓人娶宗室女事，以證伊斯蘭教徒多姓劉者，其說誠是。但藤田氏以劉為伊斯蘭教徒慣用名字之音譯，固不可信，而桑原氏以廣州通商回教徒之劉氏實南漢之賜姓，今若以復愚之例觀之，其說亦非是。鄙見劉與李俱漢唐兩朝之國姓，外國人之改革姓者，往往喜採用之，復愚及其他伊斯蘭教徒之多以劉為姓者，殆以此故歟？關於復愚氏族疑非出自華夏一問題，尚可從其文章體制及論說主張諸方面推測，但以此類事證多不甚適切，故悉不置論，謹就其以劉為氏，而家世無九品之官，四海無強大之親，父子俱以儒學進仕至中書舍人禮部尚書，而不祭祀先祖，及籍貫紛歧，而俱賈胡僑寄之地三端，推證之如此。⁶⁷

這三項「索胡」的標準，較之藤田氏的推論，較為妥善。如果與南漢劉氏相印證，固有可操作性，然也有可發覆處。以康陵出土的〈哀冊文〉這筆新材料來看，其先祖血統問題尚可從其文中假託漢朝皇族劉氏後裔並謳歌其

65 《舊五代史》，卷135〈僭偽列傳〉，頁1808：「陟性雖聰辯，然好行苛虐，至有炮烙、剝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據爐炭」。《資治通鑑》（卷283〈後晉紀四〉，頁9236）也說他「作水獄以毒人」，水獄就是「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

66 參見（日）藤田豐八著，何健民譯，〈南漢劉氏祖先考〉，《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頁137-150。

67 陳寅恪，〈劉復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365-366。

文化建設方面來求證，但也屬於「不甚適切」的證據之列。因為新權貴的氏族源流文本裏如是附會，在歷史上是尋常事，而器重文化一項僅可作為輔證而已。

史書關於南漢劉氏的祖先世系，都只能追溯到劉襲祖父劉安仁這一代，且印證劉復愚故事，其發家顯赫是從劉襲父劉謙（知謙）開始的。劉氏先祖問題，概括起來有下述幾點，其中疑點也一目了然：（1）諸史所記皆僅追述至祖父一代，名安仁（《新五代史》、《資治通鑑》、《文獻通考》、《輿地紀勝》），或仁安（《舊五代史》、《冊府元龜》、《宋史》）；（2）籍貫上蔡（《新唐書》、《新五代史》、《東都事略》、《宋史》等），或彭城（《舊五代史》、《冊府元龜》）；（3）其遷徙有兩說：自上蔡遷徙福建（泉州），又遷徙廣州經商（《新五代史》等），至劉謙時從政崛起；或自彭城遷潮州，祖父為潮州長史（《東都事略》、《宋史》作刺史），因家嶺表。關於此遷徙問題，藤田豐八〈祖先考〉取劉安仁居家福建以商賈為業後移商廣州說，但認為上蔡或彭城籍貫說都是附會；劉安仁活動地區（福建泉州和廣州）皆當時海外交通之要地；孫光憲《北夢瑣言》所記韋宙出鎮南海時以兄女嫁劉謙，其妻以為劉謙「非我族類，慮招物議」，則劉謙在體質上為異族特徵，「由此觀之，亦足證其非漢人」；《萍洲可談》記載的廣州蕃坊劉姓，與南漢劉氏同為海道入華阿拉伯人之後裔。

藤田、陳氏之後，南漢劉氏先祖乃至南漢史問題的探討，因為缺乏新資料而無所進展。如今，隨著康陵考古新材料的出土，其中的幾個疑點，使得南漢先祖的舊問題重新泛起：

一是隨葬的哀冊，根據文獻記載和實物資料，唐代以來的哀冊都是玉冊形制（詳前述），唯有此南漢高祖哀冊為石碑形制，即使與發現的五代十國其他陵墓哀冊相比，也是獨一無二的。既按禮制隨葬哀冊卻又採取獨特的、不合規範的形制，這個做法表明了南漢在對待傳統禮制上，採取的是敷衍、陽奉陰違的態度。

其二，高祖〈哀冊文〉裏表達的追尊兩漢創始人為先祖，與實際不立廟祭祀（如後唐、後漢的宗廟制度），這個反常現象與前述哀冊問題相似，也表明對待傳統禮制的態度。以上兩方面，表明劉氏對中國傳統禮制的生疏，雖在延攬的士人幫助下得以開國建邦，但畢竟是被動的接受；加上以武功得天

下的一方霸主，對繁瑣的中國傳統禮制會持主動的敷衍態度，採取標新立異的做法。更進一步，識者可以推論這裏面包含有劉氏先祖非華夏族血統的因素，反過來也可以認為，正是由於劉氏先祖的非華夏族血統，使得他們在對待華夏傳統禮制上採取如是態度。

其三，康陵的陵園形制中，墓室上方建造有一種特殊形制的陵臺，與傳統陵墓墓上建制中的封堆似是而非。它下部是一層方形的臺基，上面是一座圓柱形、向頂部漸趨收縮的建築，夯土芯，外層包砌以磚，可能是覆鉢狀的圓頂，類似傳統「窣堵婆」(stūpa)的塔身形制。這座塔形建築的南壁上，建造出一個龕狀的結構，被盜洞和晚期灰坑破壞，寬118、進深119、殘高16.5釐米，東側還殘留一塊黑色門砧石，雖然結構已不完整，可以推測是建造在塔狀封堆上的門。陵臺前方位置接一座長方形的臺基建築，發掘報告稱之「祭臺」。⁶⁸在五代墓葬中，類似形制的墓上建制見於成都前蜀王建墓（永陵），但不包磚。⁶⁹這種陵墓形制，與唐代陵墓的兩種形制——以山為陵和覆鬥形（金字塔形）陵臺皆不同。

問題很明顯：在唐及五代的墓葬中，王建墓和劉襲墓所採用的這種圓塔狀陵臺，其意義是什麼？二墓的另一個相似之處，是在後室裏擺放逝者的雕像，⁷⁰王建墓則將玉哀、謚冊和謚寶擺放在石像前的石祭臺上，使墓葬的後室具備了寢廟的實質。因此，聯繫到墓室內的特殊建制，墓上的這種陵臺就更顯出其特殊意義。其中，劉襲墓或許模仿自王建墓。⁷¹這種陵墓新形制，旨在標新立異。它的基本結構，是在正方形基座上構造圓塔形陵臺，既與

68 參見〈廣州南漢德陵、康陵發掘簡報〉，《文物》2006.7: 4-25。

69 馮漢驥，《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頁5-6。五代十國經發掘的陵墓，另有南京南唐二陵、臨安五代吳越國康陵以及福州閩王王審知夫婦墓。參見南京博物院，〈南京牛首山南唐二陵發掘記〉，《科學通報》2(1951.5): 496-505；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臨安市文物館，〈浙江臨安五代吳越國康陵發掘簡報〉，《文物》2000.2: 4-31；福建省博物館、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唐末五代閩王王審知夫婦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5: 3-29。

70 王建墓擺放的是石像。據黎遂球和屈大均的記述，劉襲墓擺放的是「金人」（可能是金屬所鑄的像）。參見明·黎遂球，〈弔南漢劉氏墓賦並序〉，《蓮鬢閣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83冊），卷1，頁30-31；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9，頁495-496。

71 據《十國春秋》卷36〈前蜀本紀二〉（頁528），王建卒於後梁貞明四年（918），在劉襲之前。劉襲殂於後晉天福七年（942）。參見《資治通鑑》，卷283〈後晉紀四〉，頁9236。

「窳堵婆」及穆斯林陵墓「拱北」(qubut)的基本形制有相似之處，也使人聯想到中國傳統的祭天「圓丘」。

據認為中國古代穆斯林陵墓的形制，是所謂「正方形上罩圓頂」的構造(即「拱北」)，從阿拉伯本土沿襲過來。⁷²廣州桂花崗清真先賢墓，即著名的宛葛斯(Saad Wakkas)墓，現存形制也是這種「拱北」式樣。⁷³雖然，我們應當注意阿拉伯本土的穆斯林陵墓考古資料，⁷⁴以及唐宋廣州蕃、漢文化交流的趨勢。⁷⁵但康陵這種形制，並不是典型的「拱北」或「窳堵婆」，而有可能是模仿祀天的「圓丘」。理由是劉襲的獨特諡號「天皇大帝」以及前述哀冊等種種標新立異的做法。按唐高宗故事，「天皇大帝」配祀於南郊祭天之圓丘。

上述康陵考古資料提供的新線索，三個重要疑點都指向南漢劉氏對待中國傳統禮制的基本態度：敷衍，甚至陽奉陰違、標新立異。在五代十國，「僭越」和禮制鬆弛雖然是普遍現象，但某些方面南漢劉氏的做法更大膽。如果把這種態度放到劉氏先祖血統問題的背景下給予解釋，似乎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依筆者之見，藤田、陳氏之說綜合比觀之下，可取處有三：(1)南漢皇族劉氏先祖為非華夏族，至劉安仁輩已經華化，劉謙父子為華化異族的後裔；(2)與劉復愚父子的華化、成功模式相比，二者是同途而殊歸，相同點是取華化姓名，「家世無九品之官，四海無強大之親」，籍貫紛歧，不同點是一個在和平年代以文仕進，一個則是在亂世局面中以軍功取得成功；(3)劉氏自劉安仁一代因時局原因而遷徙福建(泉州)、廣州經商，至劉謙時由經

72 參見高永久，〈中國穆斯林陵墓建築佈局比較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6: 17、19。

73 參見劉致平，《中國伊斯蘭教建築》(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頁193-196。他認為其基本結構可能是唐代的。

74 參見Richard Ettinghausen and Oleg Grabar,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slam: 650-125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16-222, 267-273.

75 參見藤田豐八，〈南漢劉氏祖先考〉，《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頁146，及桑原鶯藏著，陳裕菁譯，《蒲壽庚考》(上海：中華書局，1929)，第二章「蕃客僑居中國之狀況」，頁47、76-83(關於通婚及「番學」的注)；羅香林，〈唐宋時代廣州之回教〉，《清華學報》新5.1(1965): 5-6。

商而投軍從政，直至建立割據嶺南的獨立政權。除此之外，筆者可以提出的新說如下：

(1) 祖籍上蔡及「世居咸秦」說都有其道理所在，唐代上蔡一帶可能是賈胡僑居地之一，或落腳點；

(2) 南漢劉氏可能是自劉安仁一代從北方上蔡遷徙到福建、廣州經商的華化賈胡之後裔；

(3) 劉氏或許是至劉安仁時開始採用的漢姓，劉安仁可能原名安仁，是安氏「九姓胡」後裔。

這幾個問題都涉及到了唐代「胡人」在中國的活動情況，以及唐末局勢和北人南遷的問題。

劉氏的籍貫，文獻中記載的兩說——上蔡和彭城，後者是在劉隱顯貴後才興起的。據《通鑑》記劉隱封大彭王，胡三省注說：「自宋武帝以彭城之裔興於江南，後多以彭城之劉為名族。劉隱封大彭王，意蓋取此」。⁷⁶ 附會色彩較明顯。《東都事略》、《新五代史》等所稱的上蔡說，雖藤田氏以為是假託，不過，此「籍貫紛歧」恰印證陳寅恪所論，只是關於上蔡是否「賈胡僑寄之地」的問題，就史料及墓誌資料等來看，現在還不明白，也許將來有所發現，可以印證。

又據《東都事略》，說劉夔「見北人必自言世居咸秦，恥為南蠻主。呼中朝天子為洛州刺史」。⁷⁷ 「世居咸秦」說法，也不僅是劉夔見北人而自抬家世郡望的誇詞，可能也有事實的成分，即其家族史記憶中，曾在關中一帶（可能是長安）居住過，後來遷居到了上蔡。這個做法多少有點像「安史之亂」後部分「胡人」那種套用郡望的手法，以掩蔽其胡族身分。⁷⁸ 史書所載劉夔先世也只是到其祖父一代，必與其本人對籍貫的記憶有關，為祖上曾居住關中（咸秦），後徙居上蔡；自祖父安仁遷徙福建，後到嶺南。這時是唐末

76 《資治通鑑》，卷266〈後梁紀一〉，頁8680。

77 宋·王稱，《東都事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140冊別史類），卷23，頁162。
另見《新五代史》，卷65〈南漢世家〉，頁812；《舊五代史》，卷135〈僭偽列傳第二〉，頁1809。

78 參見榮新江，〈安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暨南史學》第2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頁102。

(劉謙卒於乾甯元年，894)。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上蔡屬蔡州，隸河南道，在州治南七十里，淮水沿岸。彭城屬徐州，河南道，在淮水支流泗水沿岸。⁷⁹

「安史之亂」後，以中亞粟特(Sogd)裔為主的「胡人」，在排胡的壓力下，一部分採取改變姓氏、郡望等方法來自保，另外的生存手段是遷徙到較安全的地區。這種地區應是在唐的邊疆，其中大批遷徙到河北地區安、史老巢的河朔三鎮，⁸⁰但這不可能是其全部，也許有一部分人隨著唐末以來南遷的潮流，遷徙到長江流域，⁸¹進而徙居到廣州、泉州等地。限於文獻和考古資料，這部分南遷「胡人」的詳情尚不清楚。《新五代史》〈南漢世家〉說：「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⁸²上蔡劉氏南遷，可能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開展的。

唐末五代至宋初，至少在統治階層中，民族(種族)的色彩已經淡化，⁸³而就這個時代中國的民族認同及民族關係上來講，仍然是讓位於「種族文化觀」中的「文化」，⁸⁴體現為以儒化為象徵的所謂「漢化」趨勢上。這是特別針對各種史料(包括出土文獻、墓葬等資料在內)中豐富的「胡人」資料而言的。然而唐宋民族史和中外關係史領域裏的一個問題，是入華「胡」、「蕃」的種族和社會身分的識別，及其華化的程式。如說唐末是中原、關中胡裔商賈、穆斯林南遷廣州、泉州的一個集中時期，⁸⁵也還需要更多的證據。而廣

79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9〈河南道五〉，頁224、241。

80 參見森部豐，〈唐後期至五代的粟特武人〉，《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231-233。

81 1990年在湖北英山縣畢家坳發現的畢氏家族墓地，出土了畢昇夫婦等墓碑，推為北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所立。林梅村以為墓主畢昇係粟特畢國(九姓胡)入華之摩尼教徒，此畢氏家族是安史之亂平定後不久回鶻可汗派到江南經商和傳教的粟特商人的後裔。參見林梅村，〈英山畢昇碑與淮南摩尼教〉，《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2: 137、141。此說有異議。

82 《新五代史》，卷65〈南漢世家〉，頁811。

83 參見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80、82。

84 「種族文化觀」，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1-48。

85 參見秦惠彬，〈伊斯蘭教在五代時期的發展〉，《世界宗教研究》1989.1: 129。

州在唐代已有通過海路的阿拉伯、波斯等裔「蕃客」聚居，至唐末已形成中心。這個趨勢，與南漢劉氏的南遷若相呼應。

本文要否認的，是藤田所立論的南漢劉氏先祖為海道入華阿拉伯裔的說法，而認為劉氏既非阿拉伯裔，也不是自海道入居泉、廣，而可能是唐末隨遷徙潮流南下的華化賈胡。理由如下：

其一，從史料和〈哀冊文〉裏，尙未見到劉氏信仰伊斯蘭教的跡象。藤田所依據的，僅是文獻記錄唐宋廣、泉一帶蒲氏穆斯林「蕃客」的資料，以及宋代廣州蕃坊有劉姓蕃客娶宗女的事蹟。⁸⁶但這種劉姓蕃客還不能證明就是穆斯林，因為蕃坊裏的蕃客原籍、信仰都很複雜，而且因為是宋代事例，不能用來證明前代。九世紀中葉至十世紀初的阿拉伯遊記《中國印度見聞錄》（即《蘇烈曼遊記》及阿布·賽義德·哈桑的續編）裏，提到黃巢在廣州殺害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十二萬人。⁸⁷則唐末廣州是多元宗教且多國蕃客並存的局面，尤其是這四種夷教的信徒。而據〈哀冊文〉中所透露的劉襲本人的信仰傾向，是在道教和佛教上的趣味，此外還在儒學、術數等上有造詣，是個興趣廣泛的人。如劉氏為阿拉伯裔，其伊斯蘭教信仰的跡象應有所顯露，至少對佛、道應採取迴避態度。此外，唐代尙未見有大食蕃客與漢人通婚的記載，這種情況至宋代才開始出現，記載也較多。⁸⁸綜上，在懿宗咸通年間（860-873）與宰相韋宙侄女通婚的劉安仁之子劉謙，⁸⁹是穆斯林出身的可能性不大。

其二，劉安仁的姓名值得懷疑，事涉劉安仁的本姓名及其劉姓來源問題。案唐迄宋代廣州大食蕃客的各姓氏，除阿語音譯的大姓蒲氏外，其餘有取漢姓的李姓（李彥昇），漢化姓氏的有海、哈、金、米、丁等，未見劉

86 宋·朱彧，《萍州可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344冊小說家類），卷2，頁293。

87 參見穆根來等，《中國印度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96。數字上雖有問題，但這四種教徒應都是在廣州僑居的「蕃客」。

88 參見甘正猛，〈唐宋時代大食蕃客禮俗考略〉，蔡鴻生主編，《廣州與海洋文明》（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頁16-19。

89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15〈劉知謙傳〉，頁5490：「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為清海牙將，節度使韋宙以兄女妻之，眾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托之。』」

姓；⁹⁰ 而宋代僑寓廣州的蕃客來源多樣、姓氏較複雜，除大食裔諸姓外，還有來自南海諸國（地）占城、三佛齊、真臘、勃泥等的李、娑、辛、至、層、打、朱、金、摩等二十餘姓，此外是不知來源的娶宗女的劉姓。⁹¹ 史料記載明確的劉姓蕃客是宋代才出現。桑原鷺藏以為「中國回民多姓劉」，「唐代每以國姓賜外國人，此劉姓回民，或南漢劉氏賜與廣州蕃客者」。⁹² 這是因果倒置，前提是南漢劉氏為穆斯林。

由此可見，唐末、五代出現在廣州的南漢劉氏，與此時生活在當地的各族蕃客既不同姓，因此也不可能同源；不可能來自海上，而據各史所記是來自內地，他們也不一定是穆斯林。其遷徙嶺南的路徑，是可能從關中到上蔡，之後到福建，最終在廣州。不斷遷徙的原因，是受到時局的壓力，以及經商的需要。

南漢太祖劉安仁姓名的來歷，據《新唐書》〈田頽傳〉，唐末有一位沙陀叛將安仁義，曾投奔淮南楊行密。⁹³ 這個「安仁義」，應是突厥化安氏胡的漢名。⁹⁴ 劉安仁的例子，可能也同此故事，他的本姓為安，名仁，是安氏胡出身的賈胡，但已經華化；劉姓是後來所改的漢姓，加在其本姓名前，可能是從劉安仁時開始的。

綜觀唐宋時期，廣州、泉州等沿海港口城市，是中國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地區，而這個時期恰是中國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基本格局由以陸路為主轉向海路為主的時期，其動因之一，是絲綢技術的擴散帶動的絲綢貿易衰落，⁹⁵ 以及中國瓷器製造業的興盛帶動的海上貿易。這個轉型對於以陸路貿易為業的粟特裔商賈來說，應產生一定的影響，加上「安史之亂」後至唐末局勢的一連串變化，部分北方華化賈胡隨著南遷的潮流向沿海商埠遷徙，是有可能的。

90 參見甘正猛，〈唐宋時代大食蕃客禮俗考略〉，《廣州與海洋文明》，頁 6-14。

91 參見陳學軍，〈宋代廣州的蕃姓海商〉，蔡鴻生主編，《廣州與海洋文明》，頁 65-87。

92 參桑原鷺藏，《蒲壽庚考》，頁 76-77。

93 《新唐書》，卷 189 〈田頽傳〉，頁 5476。

94 實際是森部豐氏最近研究中所說的「突厥化粟特人」，參見森部豐，〈唐後期至五代的粟特武人〉，《粟特人在中國》，頁 227。

95 參劉文鎖、王磊，〈論絲綢技術的傳播〉，《歐亞學刊》第 4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251-252。

五、結 論

本文對番禺出土南漢康陵〈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的考釋，與歷史文獻互證，試圖揭示南漢國及高祖劉龔的若干史實，並進而引申到劉氏先祖的血統和來源問題。結合史書和〈哀冊文〉所記種種跡象、線索，筆者推測：南漢劉氏先祖可能是唐代入華、定居的賈胡，不是自海道入華的阿拉伯或波斯裔「蕃客」，而可能是安氏「九姓胡」後裔，於唐末避亂改姓氏，隨南遷潮流逐漸遷徙泉州、廣州經商，後代從軍以武功建立割據嶺南的政權。

後記：本項研究受香港中山大學高等學術研究中心基金會資助。作者感謝該基金會之成美，及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小穀圍康陵、德陵墓葬發掘主持者張強祿、全洪先生，承其惠允考察二陵發掘現場並賜告有關信息。碑文隸錄以及搜求著錄康陵碑的金石著作，小友王磊（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幫助不少，特此誌謝！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五代·孫光憲撰，賈二強點校，《北夢瑣言》，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宋·王溥，《五代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78。

-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 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64。
-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宋·路振，《九國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33冊別史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據清道光二十四年錢氏刻守山閣叢書本影印。
- 宋·錢儼，《吳越備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2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佚名，《五國故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2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王稱，《東都事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14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宋·朱彧，《萍州可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34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方信孺，《南海百詠》，清·阮元輯，《宛委別藏》第10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宋·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4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徐天麟，《西漢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
- 宋·陶穀，《清異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35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明·黎遂球，《蓮鬚閣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8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黎延祖刻本影印。
- 清·梁廷柟著，林梓忠校點，《南漢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
- 清·梁廷柟著，林梓忠校點，《南漢書考異》，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
- 清·梁廷柟，《南漢叢錄》、《南漢文字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34冊別史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2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翁方綱，《粵東金石略》，《石刻史料新編》第17冊地方類，臺北：新文豐出版

- 公司，1986，據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影印。
- 清·王士禛，《皇華紀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5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私藏清康熙王氏家刻後印本影印。
-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3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萬斯大，《學禮質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2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徐乾學，《讀禮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0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清·嵇璜、劉墉等，《續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清·吳蘭修，《南漢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 清·吳蘭修，《南漢紀》，《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34冊別史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據上海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四年鄭氏淳一堂刻本影印。
- 清·郝玉麟等監修，魯曾煜等編纂，《廣東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320-3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二、近人論著

- 甘正猛 1997 〈唐宋時代大食蕃客禮俗考略〉，蔡鴻生編，《廣州與海洋文明》，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臨安市文物館 2000 〈浙江臨安五代吳越國康陵發掘簡報〉，《文物》2002.2: 4-31。
- 林梅村 1997 〈英山畢昇碑與淮南摩尼教〉，《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2: 137-147。
- 南京博物院 1951 〈南京牛首山南唐二陵發掘記〉，《科學通報》2(1951.5): 496-505。
- (日) 桑原鷲藏著，陳裕菁譯 1929 《蒲壽庚考》，上海：中華書局。
- 秦惠彬 1989 〈伊斯蘭教在五代時期的發展〉，《世界宗教研究》1989.1: 129-133。
-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 1972 〈唐懿德太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7: 26-32。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2005 《唐李憲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富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2004 《唐節潛太子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 高永久 1993 〈中國穆斯林陵墓建築佈局比較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6: 16-21。
- 宿白 1999 《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大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
- 陳寅恪 1997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陳寅恪 2001 《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
- 陳寅恪 2001 《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
- 陳學軍 1997 〈宋代廣州的蕃姓海商〉，蔡鴻生編，《廣州與海洋文明》，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 (日) 森部豐 2005 〈唐後期至五代的粟特武人〉，《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
- 馮漢驥 1964 《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 榮新江 2003 〈安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暨南史學》第2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102-123。
- 福建省博物館、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1991 〈唐末五代閩王王審知夫婦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5: 3-29。
- 劉文鎖、王磊 2004 〈論絲綢技術的傳播〉，《歐亞學刊》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
- 劉致平 1985 《中國伊斯蘭教建築》，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5 《銖積寸累——廣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選萃》，北京：文物出版社。
-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6 〈廣州南漢德陵、康陵發掘簡報〉，《文物》2006.7: 4-25。
- 鄧小南 2006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書店。
- 穆根來等 1983 《中國印度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
- 羅香林 1965 〈唐宋時代廣州之回教〉，《清華學報》新5.1: 1-12。
- (日) 藤田豐八著，何健民譯 1936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北京：商務印書館。
- Ettinghausen, Richard, and Oleg Grabar. 1994.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slam: 650-125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search on the Epitaph of the Southern Han Emperor Gaozu, with Discussion on the Royal Liu Family's Ancestry

Wensuo Liu*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ly discovered epitaph entitled “Gaozu Tianhuangdadi Aicewen” 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 from Liu Yan’s 劉龔 mausoleum in Kangling 康陵. Comparing the original Kangling epitaph with postscripts in works on bronze-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with history books, raises several important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Southern Han dynasty and its founder Liu Yan (who reigned from 917-942).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system of conferring posthumous titles in Southern Han and the temple titles of dead emperor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uthor of the epitaph, the administrative achievements during Liu Yan’s reign, his religious orientation, and also his abilities and interests in magical calculation or fortune-telling, and in healing and medical arts, etc.

In this epitaph, the parts that laud Liu Yan’s cultural achievements and promotion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are especially worth noting. They stand in stark contrast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at exaggerate the atrocities by this so-called “despot.”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question about the royal Liu family’s ancestry by analyzing newly discovered evidence. Based on the

* Wensuo Liu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Guangdong.

analysis, it is clear that Liu Yan's ancestors originated from the Hu 胡, who settled in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D.), and who later moved first to the Huai River area, and then to Fujian and Guangzhou (Panyu) a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Through struggle and personal ability, along with the opportunity and chance afforded them at this time in history, they were able to found an independent dynasty in the Lingnan region. They were not of Arabian or Persian descent.

Keywords: Southern Han, Kangling mausoleum, epitaph of Gaozu, Liu Yan 劉龔, Hu ancestry,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